

# 从欧亚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米尔斯基文学批评的政治维度\*

杨明明

**摘要：**米尔斯基是20世纪俄侨界最优秀的文学批评家之一，同时也是欧亚主义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他的一生经历了从欧亚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演变，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俄国文学史》一书更是被纳博科夫赞誉为“用包括俄语在内的所有语言写成的俄国文学史中最好的一部”。在其文学批评活动中，欧亚主义作为一种意识、一种旨趣、一种范式或明或暗地显现于其各个时期的著作与论文当中，从而赋予了其文学批评以不同于其他俄侨批评家的历史感、现实性与跨界性。

**关键词：**米尔斯基 欧亚主义 马克思主义 俄国文学史

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Дмитрий Петрович Святополк-Мирский，1890—1939）是20世纪俄侨界最为优秀的文学批评家之一，同时也是欧亚主义运动的重要参与者。长期以来，其丰厚的学术遗产在俄罗斯一直处于被遗忘的状态，直至其代表著作《俄国文学史》于20世纪末被译为俄语并于2001年在俄罗斯出版，才重又被学界所发现与关注。

米尔斯基一生命运多舛，成长于俄罗斯沙皇时期，成名于英国，最后选择回归苏联，从名门贵族、白军军官、俄侨精英到“红色公爵”“公爵同志”，其思想呈现出从欧亚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演变轨迹。

\* 本文是作者承担的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俄罗斯文学与欧亚主义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5BWW030。

在其各个时期的文学批评活动中，欧亚主义作为一种意识、一种旨趣、一种范式或明或暗地显现于其著作与论文中，从而赋予了其文学批评以不同于其他俄侨批评家的历史感、现实性与跨界性。

## 一、走上文学批评之路

米尔斯基出身古老的公爵世家，其父彼得·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公爵是著名的亲英派国务活动家，曾出任沙皇俄罗斯的内政部长。在亲英派父亲与以英语为家庭教育传统的母亲的影响下，米尔斯基自幼就能熟练地使用英语交际、阅读与写作，并对英国心生向往。中学时代他曾与日后蜚声苏联文艺界的日尔蒙斯基、普姆皮扬斯基等著名学者同窗。1908年他考入彼得堡大学东方语系学习汉语和日语，期间还曾旁听过温格罗夫教授的普希金专题讨论课。这段学习经历成为米尔斯基欧亚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

1911年米尔斯基应征入伍，服役期间居住于皇村，结识了古米廖夫等诗人。同年出版的《诗集》一书是米尔斯基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诗集，该书在体裁、形式与内容等方面都带有某种东方色彩与印迹，其中的《亚洲》一诗更是反映了作者对东方与西方、欧洲文化的衰老以及东方的觉醒等问题的思考，表现出某种“前欧亚主义”风格。退伍后他回到彼得堡大学，转入古典语文学专业继续学习，1914年毕业。复学期间他还加入了自由美学社，结识了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等阿克梅派诗人，成为文学团体“诗人车间”的成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再度入伍，因反战言论被流放高加索。后来据他本人回忆，他还借回家族领地之机于1918年获得了哈里科夫大学历史学系的毕业证书。国内战争时期他加入了白军，1920年随军进入波兰，后经雅典辗转来到英国，1921年开始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担任教授。

20世纪20年代英国民众对俄罗斯文学的了解还仅限于那些“一战”前被译成英语的19世纪俄罗斯经典小说，而对20世纪初俄罗斯

诗歌的繁荣局面一无所知。在英国人眼中，俄罗斯只是一个“遥远的、异己的国度，在精神方面还保留着很多西方消失已久的原始自发性”<sup>①</sup>。这种误读与轻视无疑令米尔斯基痛心疾首，于是，向英国读者乃至西方介绍俄罗斯文学成为当务之急。他认为：“西方人写的俄罗斯文学概要的开头习惯于这样告诉读者：俄罗斯文学有别于其他国家的文学，因为与其联系最密切的是社会史与政治史。其实完全不是这样。俄罗斯文学特别是1905年之后的文学，与政治疏离得惊人，而且是在空前的政治动荡并且文学还是其见证者这一背景之下的。即使在谈到政治话题时，当代俄罗斯作家实质上也与政治格格不入；即使像马雅科夫斯基那样写作宣传性的东西，也是把宣传当成手段而非目的。”<sup>②</sup>为此，他在讲授俄罗斯文学课程之余，还积极向欧洲介绍俄罗斯文学。为了让西方学界和读者了解俄罗斯文学的全貌及发展历程，他不仅编纂了《俄罗斯抒情诗：从罗蒙诺索夫到帕斯捷尔纳克的小型俄罗斯诗选》（1924），还用英语撰写了大量著作论文，如《现代俄罗斯文学》（1925）、《普希金》（1926）、2卷本《俄国文学史》（1926，1927）、《俄罗斯史》（1928）、《俄罗斯：社会史》（1931）等著作，其中《普希金》一书被公认为用英语写作的有关普希金的著作中最好的一部，《俄国文学史》更是被纳博科夫赞誉为“用包括俄语在内的所有语言写成的俄国文学史中最好的一部”，至今仍被西方学者奉为了解俄罗斯文学最好的教科书，甚至连伍尔夫、劳伦斯、海明威等作家也都是通过米尔斯基的著作文章了解俄罗斯文学的。不仅如此，他还用多种语言在法国、德国、美国、意大利等国的期刊上发表论文，从而引起了西方学界的广泛关注。随着《俄国文学史》等著作的问世，米尔斯基被公认为俄侨界乃至西方最为优秀的俄罗斯文学专家。“其分析思想贯穿于艺术文

① Джеральд Смит, “Параболы и парадоксы Д. Мирского”, в кн. Дмитрий Мирский, *О литературе и искусстве: Статьи и рецензии 1922–1937* (М.: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2014), с. 13.

② Дмитрий Святополк-Мирский,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по 1925 год*, пер. Р. Зерновой (1992; Новосибирск: Свиньин и сыновья, 2009), с. 455–456.

本或语文学研究，为了建立自己独特的俄罗斯文学标准而汲取此前未被系统描述与分析的材料。特别重要的是米尔斯基是在文学史而不仅仅是文学批评的范畴内把握当下文学”，其对“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卓有成效的整合”，在当时的俄侨界是无人能及的。<sup>①</sup>

## 二、反欧洲中心主义

20世纪20年代是米尔斯基学术生涯的巅峰，同时也是其思想发展演变的重要阶段。来到英国后，米尔斯基越发感到西欧正在走向没落，而“与衰老的战后西欧文明相比，俄罗斯经历了革命与国内战争的巨大而空前的考验，走向了新生”<sup>②</sup>。对西欧文明由崇拜到批判的立场转换使其与欧亚主义者日益接近，并最终成为由俄侨文化精英组成的欧亚主义阵营的一员。其实早在1922年他就在英国的《俄罗斯生活》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欧亚主义运动的简讯及其宣言，并于1925年在英国组建了欧亚主义小组。1926年他又与苏甫钦斯基一起创办了《里程碑》杂志，撰写并发表了一系列文笔犀利的有关俄罗斯与西欧的文学和文化的文章，对于推动欧亚主义运动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欧亚主义作为一个对20世纪俄罗斯影响最为深刻的政治思想与历史哲学流派，虽然诞生于俄侨思想精英对国家发展道路的思考，但却并未囿于单纯的理论建构，而是表现出强烈的实践诉求。欧亚主义的核心观点就是帝国理论，即俄罗斯是帝国，也只能是帝国，它不仅是基辅罗斯的继承者，也是金帐汗国的继承者。一直以来，欧洲传统和亚洲传统并存于俄罗斯文化传统之中，亚洲的新鲜血液注入停滞衰老的欧洲血液之中，也必将带来俄罗斯的复兴。欧亚主义者是坚定的反

<sup>①</sup> Михаил Ефимов, “Статьи и рецензии Д. П. Святополк-Мирского в журнале «Slavische Rundschau» (1929–1932)”,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факт*, 1–2 (2016), с. 85.

<sup>②</sup> Джеральд Смит, “Параболы и парадоксы Д. Мирского”, в кн. Дмитрий Мирский, *О литературе и искусстве: Статьи и рецензии 1922–1937*, с.18.

欧洲中心主义者，他们坚决反对俄罗斯的欧化，认为俄罗斯不应盲目追随西方，而应该探寻一条适合自己的独特发展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俄侨精英们建构的欧亚主义是一种“革命的”或“后革命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米尔斯基将欧亚主义归入席卷欧洲的民族自觉运动，认为欧亚主义作为“民族历史哲学思想的表达”，是十月革命以来俄侨在“政治思想领域”取得的最高成就。在他看来，欧亚主义者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他们认为俄罗斯是独立的文化世界，既不像欧洲，也不像亚洲。<sup>①</sup>

米尔斯基身兼文学批评家与欧亚主义思想家，这种跨界性就决定了其学术成果的独特性。反欧洲中心主义乃至欧亚主义的思想倾向在其20世纪20至30年代初的著作和论文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例如，他在《论当代英国文学（来自伦敦的信）》（1923）一文中指出，英国诗歌虽然曾经有过浪漫主义的辉煌，但当代英国诗歌却是“没落的、步履蹒跚的，本质上已经惫惫不堪”<sup>②</sup>；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俄罗斯诗歌创作的繁荣局面。他甚至还在《俄罗斯小说的复兴》（1923）一文中宣称，即便是俄罗斯小说在契诃夫逝世后经历了一段低潮时期，但扎米亚金及其创立的、旨在培养青年作家的文学团体“谢拉皮翁兄弟”也正在将俄罗斯小说创作推向新的高潮。此外，他在《年轻的俄罗斯小说家们》（1925）一文中将当代俄罗斯小说划分为两个阵营，“一派是以情节取胜的西欧派作家，另一派则是文辞华美的欧亚派作家”，“只有后者才真正体现了俄罗斯文学生机勃勃的精神”，而“西欧派作家最大的不幸在于俄语在他们手中退化为丑陋的、粗制滥造的、

---

① Ольга Казнина, “Князь Д. П. Святополк-Мирский: талант и судьба”, 2017-09-12, <http://russianpresence.org.uk/index.php/history/3045-князь-д.п.-святополк-мирский-талант-и-судьба.html>, 2018-06-18.

② Дмитрий Мирский, “О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англи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Письмо из Лондона)”, в кн. Дмитрий Мирский, *О литературе и искусстве: Статьи и рецензии 1922-1937*, с. 38.

呆板乏味的东西，好像是从‘外语’翻译过来似的”。<sup>①</sup>将同时代的俄苏作家划分为西欧派和欧亚派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创作进行评价构成了米尔斯基这一时期文学批评的基础。他在《康斯坦丁·费定》(1925)一文中指出“谢拉皮翁兄弟”的成员、苏联作家费定的小说是“十月革命后小说领域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他的《城与年》“值得每个不拒绝苏维埃文学的人阅读”，但其不足之处在于“语言的西欧化”。<sup>②</sup>

在《俄国文学史》一书中，米尔斯基从欧亚主义的立场出发，对西欧与俄罗斯文学、文化关系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思考。在评述《大司祭阿瓦库姆行传》时，米尔斯基特别提及《行传》曾严厉批评莫斯科公国引入德国圣像画法并告诫人们切勿膜拜此类不雅圣像。在论及彼得一世改革对俄罗斯文学的影响时，他指出俄罗斯文学虽然藉此“终于成为了一种现代文学和西方文学”，但这种“法国化的新文学仅仅面对上层阶级”，普通百姓则对其敬而远之。<sup>③</sup>在评价卡拉姆津的俄语改革时，他直言卡拉姆津弃用数百斯拉夫词汇，而引入大量法语词汇，目的是让标准俄语“与斯拉夫语和拉丁语等旧的教会语言拉开距离，变得更近似法语，一种有教养社会使用的、能够表达世俗知识的新语言”，这实际上不过是“用一种外国样板取代另一种外国样板”，导致了“文化阶层和民众之间”、“新旧俄罗斯之间的鸿沟”的加剧，其本质是“反民主的”，也是“反民族的”。<sup>④</sup>米尔斯基更是就拜伦对普希金的影响问题提出了全新的见解，认为二者之间“并无实质上的亲缘关系”，“普希金精确的、富有逻辑的风格，与拜伦凌乱的雄辩南辕北辙”。<sup>⑤</sup>米尔斯基还将列夫·托尔斯泰置于俄罗斯文学主宰者的崇高

① Дмитрий Мирский, “Молодые русские прозаики”, в кн. Дмитрий Мирский, *О литературе и искусстве: Статьи и рецензии 1922–1937*, с. 104.

② Дмитрий Мирск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 Федин”, в кн. Дмитрий Мирский, *О литературе и искусстве: Статьи и рецензии 1922–1937*, с. 119.

③ [俄]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上卷），刘文飞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2页。

④ 同上书，第81—82页。

⑤ 同上书，第119页。

地位，批评西方近年来将托尔斯泰赶下神坛而代之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是因为西方精英的“精神老化”。此外，他还指出托尔斯泰在《霍尔斯托梅尔》中采用马的视角“实质上是波斯风格、中国风格和18世纪此类写法的后裔，东方观察者在此类作品中现身”<sup>①</sup>。

米尔斯基还对有着“俄罗斯社会主义之父”之称的赫尔岑表现出特别的兴趣。这或许是缘于二人相同的人生经历，同样出身于贵族世家，受过良好的教育，身兼文学家、思想家、办报人数职，最主要的还是背井离乡、寄居异国却心系祖国这一共同命运。米尔斯基认为“赫尔岑的社会主义具有清晰的民族色彩”，对他来说，社会主义是“摧毁西方的陈腐文明，使欧洲社会衰老的肌体重新焕发生机”的“一种刺激，一种酵母”，作为“俄罗斯农业社会主义的第一人”，他“期望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俄罗斯，这种社会主义体制的基础与其说是欧洲的无产阶级传统，莫如说是俄罗斯农民的村社传统”。赫尔岑虽侨居西欧，却厌恶“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文明”，对西方“持轻蔑或冷漠之态度”。他“具有真正的民族自豪感”，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坚信“俄罗斯的活力”。<sup>②</sup>这些似乎也是米尔斯基本人思想特征的写照。

米尔斯基与其他俄侨批评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对苏联文学的承认与关注。他不仅在《里程碑》上大量刊发苏联作家的作品，还大力赞扬苏联文学的创新性，甚至在《俄罗斯诗歌现状》（1926）等文章中公开宣称俄侨文学根本无法与年轻的、生机勃勃的苏联文学抗衡。这些都从侧面反映出早在米尔斯基积极参与欧亚主义理论建构的时期，其思想就已经开始显现出某种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的兼容化倾向。

### 三、转向马克思主义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对于米尔斯基来说无疑具有决定性意

① [俄]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上卷），刘文飞译，第348、352页。

② 同上书，第288—289页。

义，他开始逐步转向马克思主义。1928年1月由米尔斯基主编的《里程碑》第三期出版，这也是该杂志的最后一期。《里程碑》的停刊对米尔斯基等人来说意味着“建立某种包括本土文学（苏联）与俄侨文学在内的跨境俄罗斯文学”的尝试告一段落。<sup>①</sup>同月他在意大利索伦托拜访了高尔基，从某种意义上说，二人的会面标志着米尔斯基与苏维埃政权合作的开始。

1928年底，他积极参与创办《欧亚报》，《欧亚报》的亲苏倾向成为欧亚主义分裂为“左派”和“右派”的导火索，而两派的根本分歧就在于对待十月革命、苏联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以苏甫钦斯基、米尔斯基、卡尔萨文为代表的左派主张承认十月革命与苏联，认为十月革命结束了俄罗斯的欧洲定位，为建立俄罗斯-欧亚国提供了可能性；苏联是俄罗斯帝国传统的延续，将带领俄罗斯-欧亚人民走上复兴之路；而马克思主义则是苏联文化的一种创造性的本土化表达，可以兼容于欧亚主义。基于这一立场，米尔斯基对苏联文学文化艺术的发展问题也越发关注。

1828—1832年间，米尔斯基所有用俄语写的文章都发表在《欧亚报》上，数量几乎占到该报发表文章总数的一半。这些文章不仅涉及政治、历史、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问题，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探讨文学、艺术与电影的。其中发表于1929年1月12日《欧亚报》上的《欧亚主义之路》一文充分表达了米尔斯基的欧亚主义思想。他在文中强调自己并没有背离早期欧亚主义的基本立场，即对与罗曼-日耳曼文化相对立的非欧洲文化的自在价值以及俄罗斯-欧亚文化普遍性与绝对性的认知与肯定；但同时他也指出欧亚主义自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存在着“美化莫斯科公国”、“将俄罗斯的未来描绘成一个东正教帝国”等右倾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倾向，这对欧亚主义的发展无疑是极为危险

<sup>①</sup> Михаил Ефимов, “Святополк-Мирский в газете «Евразия» (1928–1929 гг.): поиск синтеза «Авторского канона»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 евразийской и марксистской идеологиями”, *Вестник ПСТГУ, Серия III: Филология*, 1–41 (2015), с. 40.



的，他认为只有“用欧亚国的概念取代俄罗斯的概念才能使欧亚主义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樊篱”。此外，他认为十月革命是“俄罗斯人民开始反对彼得一世欧化改革的起义”，“开辟了新纪元”，对十月革命持赞成态度“预示着对苏维埃联邦制的接受”，只有这样才能“打开通向人类普遍主义的大门”。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米尔斯基还在文中称马克思是“所有西方思想家中我们最亲近的”，其行动哲学“在欧亚主义未来的辩证发展中仍将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sup>①</sup>文学批评类文章则主要涉及托尔斯泰、丘特切夫和契诃夫等俄罗斯经典作家、俄侨文学、苏联文学、文学与电影等内容，但在这些文章中米尔斯基却鲜少提及欧亚主义或使用欧亚主义的概念，仅在《丘特切夫》（1928）和《赫列勃尼科夫》（1929）这两篇文章中提到“彼得一世工业化时期的诗人罗蒙诺索夫的繁荣的欧亚主义不同于丘特切夫与普希金的西方主义”<sup>②</sup>，称赫列勃尼科夫“因地理原因天生就是欧亚主义者”<sup>③</sup>。

这一时期的米尔斯基与英国共产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不仅于1931年加入了英共，还应其要求撰写了一部列宁传记——《列宁：现代缔造者》（1931），并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此前以欧亚主义立场写成的《俄罗斯史》进行了修改。同年，他更是公开发表了《我为什么成为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一文，宣告自己的思想转变。1932年米尔斯基因宣传共产主义被学校解职，在高尔基的促成下回到苏联。出身贵族的米尔斯基内心深处也一直渴望可以像自己的祖先那样为国效力，回国后，他积极参与苏联的文学生活，继续从事文学批评与出版活动，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由向西方介绍俄罗斯文学转为向苏联读者介绍英国文学，特别是艾略特、乔伊斯、赫胥黎等西欧作家的作品。虽然他这一时期的文章难免受到庸俗社会学的影响，但其中仍不乏真

① Дмитрий Святополк-Мирский, “Путь евразийства”, 2016-07-06, [http://az.lib.ru/f/fedorow\\_n\\_f/text\\_1929\\_put\\_evraziisyva.shtml](http://az.lib.ru/f/fedorow_n_f/text_1929_put_evraziisyva.shtml), 2018-06-18.

② Дмитрий Святополк-Мирский, “Тютчев”, *Евразия*, 1928-12-29, 6, с. 5.

③ Дмитрий Святополк-Мирский, “Хлебников”, *Евразия*, 1929-01-26, 10, с. 6.

知卓见。他编纂的《英国新诗选》于1938年出版，更是受到了苏联读者的欢迎。

米尔斯基一生都游走于诗人、文学史家、文学批评家、政论家、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等多重身份之间。进入20世纪30年代，他似乎对自己批评家的身份有所厌倦，开始有意向历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转型。从教育背景来看，先后毕业于彼得堡大学古典语文学专业和哈里科夫大学历史学专业的米尔斯基无疑是集语文学者与历史学者于一身。他本人也多次强调自己的专业是历史而非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列宁传、2部俄罗斯史及一系列探讨俄罗斯历史与现状的文章都是米尔斯基宣示自己历史学者身份的“投名状”。从其曾经加入欧亚主义这一政治历史流派的事实来看，他后期的学术兴趣转向似乎也并非不可理解。但是，米尔斯基并未就此停止自己的文学批评活动，30年代他依然撰写了不少有关苏联各民族文学的文章。纵观米尔斯基的文学批评思想与立场的演变历程，文学与历史的结合最终赋予了其宏阔纵深的历史视野与文学批评的客观趋向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28年之后的米尔斯基开始高调宣扬“伦理学方法的回归”，主张用伦理学方法取代美学方法。<sup>①</sup>如果说米尔斯基此前的文学批评呈现出反欧洲中心主义甚或欧亚主义倾向，那么，伦理学批评与其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转向则存在着某种关联性，其批评活动的重点也转向了苏联无产阶级文学。例如，他在《尤里·奥列沙》（1934）一文中指出“奥列沙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充当着一位秉持独特立场的理论家，并且坚信自己的立场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中必不可少的因素”<sup>②</sup>；在《构思与完成》（1934）中探讨了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在苏联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在《米哈伊尔·肖洛霍夫》（1934）中称赞《静静的顿河》是苏联文学中“一股崭新而强大的力量”，拓展

① Дмитрий Святополк-Мирский, “Заметки о пролетар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Евразия*, 1928-12-22, 5, с. 6.

② Дмитрий Мирский, “Юрий Олеша”, в кн. Дмитрий Мирский, *О литературе и искусстве: Статьи и рецензии 1922–1937*, с. 255.

了苏联现实主义文学的广度与深度。<sup>①</sup>他还在《社会主义心灵的伟大工程师》(1936)和《无产阶级第一艺术家》(1936)等文章中高度赞扬高尔基是“十月革命前俄罗斯最后一位伟大的经典作家,新的无产阶级文学与苏联各民族社会主义文学之父与奠基人”<sup>②</sup>,他继承了“以往的、19世纪伟大的俄罗斯现实主义流派的优良传统”,成为了“经典艺术与新的人类社会主义艺术之间充满强大生命力的一环”。<sup>③</sup>对于已经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米尔斯基来说,将对俄罗斯国家繁荣昌盛与民族文化发展的希望寄托于苏联,与其早年的欧亚主义立场不仅并无相悖之处,甚至还有着某种渊源关系。

事实上,欧亚主义作为一种意识,仍旧隐现于米尔斯基晚期的文学批评实践当中。回到苏联后,中亚文学开始出现在他的批评视野之中。发表于30年代中期的《围绕塔吉克文学》(1935)、《苏联诗歌的花园:格鲁吉亚文学》(1936)、《格鲁吉亚诗歌》(1936)等文章和报告对塔吉克作家拉胡蒂和艾尼、格鲁吉亚中世纪诗人鲁斯塔维利等的创作、格鲁吉亚诗歌的特点及其对苏联诗人吉洪诺夫的影响问题进行了分析,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在米尔斯基看来,无论是俄罗斯文学,还是苏维埃塔吉克文学、苏维埃格鲁吉亚文学,都是苏联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他对苏联文学版图的这种建构从本质上说与欧亚主义有关“俄罗斯-欧亚国”的构想也是一脉相承的。

米尔斯基不仅是其所处时代俄罗斯文学进程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还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史家与文学批评家。他精通俄罗斯文学,熟知欧洲文学,使用俄、英、法、德、意大利等多种欧洲语言撰写了7部专著和400篇文章,编纂了2部诗选,出版了多部译著,其著述对西方

① Дмитрий Мирский, “Михаил Шолохов”, в кн. Дмитрий Мирский, *О литературе и искусстве: Статьи и рецензии 1922-1937*, с. 269.

② Дмитрий Мирский, “Великий инженер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душ”, в кн. Дмитрий Мирский, *О литературе и искусстве: Статьи и рецензии 1922-1937*, с. 338-339.

③ Дмитрий Мирский, “Первый художник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 в кн. Дмитрий Мирский, *О литературе и искусстве: Статьи и рецензии 1922-1937*, с. 339.

的俄罗斯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如此，作为一名欧亚主义活动家，他还在20世纪20年代的俄侨政治生活与文化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英国学者史密斯指出的那样：“米尔斯基曾经是也仍将是‘俄罗斯的欧洲’历史上的对话者、同行者与传播者，没有他‘俄罗斯的欧洲’几乎令人难以想象。”<sup>①</sup>近年来，米尔斯基的学术遗产在俄罗斯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从文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等多个角度对其进行解读与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建构起其思想体系的整体图景；其中欧亚主义作为一个独特而新颖的分析视角，有利于我们准确把握其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脉络，揭示其学术遗产的跨学科特征、文化民族主义定位及反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

---

① Джеральд Смит, “Параболы и парадоксы Д. Мирского”, в кн. Дмитрий Мирский, *О литературе и искусстве: Статьи и рецензии 1922–1937*, с.30.